

韩愈与衡湘文化

赵润金,刘玉芳^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 韩愈; 衡湘; 散文; 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12-05

一 “衡湘”的概念阐释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如《石鼎联句诗序》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自衡下来,旧如刘师服进士衡湘中相识,将过太白,知师服在京,夜抵其居宿。”^{[1]177}《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232}这在中国古籍中是非常早的提法,在韩愈之前罕有这种并举的概念。

关于“衡湘”中的“衡”,唐代行政区域设置衡州,《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江南西道》云:

衡州 隋衡山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衡州,领临蒸、湘潭、耒阳、新宁、重安、新城六县。七年,省重安、新城二县。贞观元年,以废南云州之攸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衡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衡州。旧领县五,户七千三百三十,口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一。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口十九万九千二百二十八。在京师东南三千四百三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六十里。^{[2]5册,1613}

衡州府辖衡山县,《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江南西道》云:“衡山:吴分湘南县置。旧属潭州,后割属衡州。”^{[2]5册,1614}关于衡山得名由来,唐李冲昭《南岳小录·叙岳》云:“南岳者,《周礼·职方氏》曰:‘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辅紫宸,钤三气之根,钧五灵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称物平施,故谓之衡山。”^{[3]90册,283}韩愈诗文中的“衡”多指衡山,如《送惠师》云:“衡山与洞庭,此固道所循。”^{[4]10册,3775}《喜雨亭记》云:“上湘水,行衡山之下。”^{[1]243}

关于“衡湘”中的“湘”,湘指湘水。据《水经注》称:“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有所谓“三湘”:潇湘、沅湘、蒸

湘。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与沅水会于湖中,谓之“沅湘”,与蒸水合流,谓之“蒸湘”。韩愈《合江亭》云:“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4]10册,3777}韩愈诗文中的多次提到湘水,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湘水清且急,凉风日修修。”^{[4]10册,3767}《忆昨行和张十一》:“念昔从君渡湘水,大帆夜划穷高桅。”^{[4]10册,3794}《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去岁羈帆湘水明,霜枫千里随归伴。”^{[4]10册,3796}《祭河南张员外文》:“南上湘水,屈氏所沉。”^{[1]216}

综合文献来看,“衡湘”成为了韩愈诗文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韩愈的生平事迹有关,他多次途经衡湘,目睹了有关衡湘的风土人情因此把它垂之于诗文。但是目睹了有关衡湘的风土人情的文人骚客在唐代途经衡湘的并不只有韩愈一人,如唐代宰相李泌,《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四本传记载:

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肃宗每谓曰:“卿当上皇天宝中,为朕师友,下判广平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其见重如此。寻为中书令崔圆、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数年,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颇承恩遇。^{[2]11册,3620-3621}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本传记载:“崔圆、李辅国以泌亲信,疾之。泌畏祸,愿隐衡山。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5]15册,4634}《光绪湖南通志》卷三十三《古迹·衡山县》云:“李泌故宅在县西北烟霞峯下,后建邨侯书院。泌隐衡山,肃宗诏治室庐于此。”^{[6]2册,881}他不像韩愈只是途经衡湘

[收稿日期] 2011-09-23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文学与衡湘文化研究”资助(编号:2010D083)

[作者简介] 赵润金,刘玉芳(1974-),男,湖南衡山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而是在南岳居住了一段时间,南岳的邨侯书院就是为了纪念他。他的诗歌如《长歌行》:“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4]4册,1126}虽然提到浏览自然风光但是却只字不提“衡湘”。又如著名道士司马承祜,也在南岳居住了一段时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云:

道士司马承祜,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籙师正,传其符篆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承祜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承祜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祜推按道经,创意为之。^{[2]16册,5127-5128}

《光绪湖南通志》卷三十三《古迹·衡山县》云:“白云先生药堂在九真观西,唐开元中司马承祜居此,号白云先生。”^{[6]2册,881}他的诗歌如《答宋之问》:“登奇峰兮望白云,怅缅邈兮象欲纷。”^{[4]24册,9636}也只字不提“衡湘”。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韩愈是思想家有关,韩愈是道统的开创者,他的理论著作如《原道》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哲学概念进行阐释。如“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为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者谓德。”概念是逻辑当中最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思想家,韩愈在思想中对“衡湘”是一种有意识的认识。因此“衡湘”就成为了韩愈诗文中经常出现的概念。

二 韩愈赴衡湘考

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可知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韩愈由监察御史贬为连州山阳令是途经衡湘的第一次:

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官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2]13册,4195-4196}。

连州是现在的广东连县,山阳是现在广东阳山县。这一年是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韩愈36周岁。在韩愈的作品当中罕有提及这次途经衡湘的经历。韩愈由连州山阳令移江陵府掾曹是第二次途经衡湘。关于江陵府,《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山南东道》云:

荆州江陵府 隋为南郡。武德初,萧铣所据。四年,平铣,改为荆州,领江陵、枝江、长林、安兴、石首、松滋、公安七县。五年,荆州置大总管,管荆、辰、朗、澧、东松、沈、基、复、巴、睦、崇、硤、平等十三州,统潭、桂、交、循、夔、高、康、钦、尹九州。六年,改平州为玉州,改巴州为岳州。七年,废基州入鄂州。其年,改大总管为大都督,管荆、辰、澧、朗、东松、岳、硤、玉八州,仍统潭、桂、交、夔、高、钦、尹等七州。其沈、复、睦、崇四州,循、康二州都督并不统。八年,废玉州,以当阳县来属。贞观元年,废鄂州,以章山来属。二年,降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其桂、潭等七州,不统也。八年,废东松州入硤州,又省章山入长林。十年,辰州改隶黔州。都督硤、澧、朗、岳四州,都督从三品。荆州领江陵、枝江、当阳、长林、

安兴、石首、松滋、公安等八县。龙朔二年,升为大都督,督硤、岳、复、鄂四州。天宝元年,改为江陵郡。乾元元年三月,复为荆州大都督府。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长史为尹,观察、制置,一准两京。以旧相吕諲为尹,充荆南节度使,领澧、朗、硤、夔、忠、归、万等八州,又割黔中之涪,湖南之岳、潭、衡、郴、邵、永、道、连八州,增置万人军,以永平为名。二年,置长宁县于郭内,与江陵并治。其年,省枝江县入长宁。至德二年,江陵尹卫伯玉以湖南阔远,请于衡州置防御使。自此,八州置使,改属江南西道。旧领县八,户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口四万九百五十八。天宝领县七,户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二,口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在京师东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一十五里^{[2]5册,1551-1552}。

江陵是现在的湖北荆州。韩愈由连州山阳令移江陵府掾曹途经衡湘写下了《送廖道士序》,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该文注释有“公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自阳山徙掾江陵府道衡山而作。”韩愈还写下了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该诗注释有:“此诗自阳山还时作。”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中也谈到他由阳山北归,在路过郴州、衡阳后,曾“委舟湘流,往观南岳”^{[1]216}。清李元度《南岳志》卷十《前献一》云:“韩愈遇赦,离阳山,及衡州……一登南岳,值秋雨晦冥,公欲祷禹。是夜投佛寺,比曙,则云忽开。”这一年是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37周岁。在韩愈的作品当中提及这次途经衡湘的经历。

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是第三次途经衡湘:

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2]13册,4198-4201}。

潮州是现在的广东潮州。这一年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51周岁。在韩愈的作品当中提及这次途经衡湘的经历。如卷《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4]10册,3859-3860}韩愈由潮州刺史而授袁州刺史则是第四次途经衡湘: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猖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2]13册,4202}。

袁州是现在的江西宜春,这一年也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51周岁。在韩愈的作品当中罕有提及这次途经衡湘的经历。

韩愈四次途经衡湘,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

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三 韩愈与衡湘道教文化的联系

(一)韩愈对道教的态度

韩愈是中国儒家学说当中道统的开创者,他对于释老有排斥的一面,如《进学解》中他的学生对他“觝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中肯评价。他强烈反对佛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他上《论佛骨表》猛烈抨击佛教,如:“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批判了佛教对社会风俗和农业生产的严重危害。“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更是强烈地提出了毁灭佛骨舍利的建议。这些激烈的言语触怒笃信佛教的唐宪宗,导致韩愈几乎被宪宗处死。他也强烈反对道教。《谢自然诗》描绘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白昼飞升的情形:“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簧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踟蹰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4]10册,3765}明确地从儒家伦理和农业生产的角度进行了谴责:“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4]10册,3766}

但是韩愈对于释老又有融合的一面,如韩愈与众多僧侣交游,写下不少诗文。如《送惠师》:“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淳。”^{[4]10册,3775}自注:“愈在连州与释常、元惠游。惠师即元惠也。”^{[4]10册,3775}《送灵师》:“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4]10册,3775}《题秀禅师房》:“桥夹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4]10册,3860}《送浮屠文畅师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扬子云称‘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吾取以为法焉。’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他也和众多道士交游,写下不少诗文。如《答道士寄树鸡》:“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4]10册,3859}《送张道士序》:“张道士,嵩高之隐者。通古今学,有文武长材,遗迹老子法中为道士以养其亲。……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

对于这种矛盾的情况,苏轼《韩愈论》:“其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作出了否定的评价。其实在唐宋以后儒释道既斗争又融合的局面已经形成,许多文人都体现出这种情况。苏轼本人也是,如《宋史》本传:“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因此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又作出了“道济天下之溺”的高度评价。

韩愈对儒释道三家的取舍中的显著特点是他对道教的

排斥不如对佛教的激烈,没有出现现象上《论佛骨表》而险些丧命的事件。主要原因在于中唐统治者如宪宗改变了初盛唐统治者如高祖、玄宗主要信奉道教的做法,而沿袭武后信仰佛教的世界观。而且信徒们对佛教的狂热痴迷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伦理和农业生产。这对儒家的伦理学造成了巨大冲击,所以作为“道统”开创者的韩愈才上了措辞强硬的表章。因为韩愈对道教的排斥不如对佛教激烈,所以他对道教文化的融合吸收较对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要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当中出现信仰道教的作品,这是他与佛教关系方面所没有的现象,如《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潮州祭神文》(五首)、《祭湘君夫人文》等。《祭湘君夫人文》作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十月,作者担任国子监祭酒。说:“前岁之春愈以罪黜守潮州,惧以遣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衰。’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卅(当为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辄敢以私钱十万修而作之。旧碑断折其半仆地,文字缺灭,几不可读,谨修而树之。庙成之后,将求玉石,仍刻旧文因铭其阴,以大振显君夫人之威神,以报灵德,俾民承事万世不怠。惟神其鉴之,尚飨。”他把自己贬谪潮州而没有病逝以及离开潮州到袁州到朝廷都归功于神灵的保佑和庇护,为了答谢神灵自己亲自出资修建庙宇,这些都充分证明韩愈已经虔诚地信仰了道教。

(二)衡山与道教文化

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唐道士李冲昭于昭宗天复二年(902)撰成《南岳小录》一卷,自序云:

遂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说》,仍致诘于师资长者,岳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贮篋笥。今据所得,上自五峰三涧,古来宫观药院,至于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庶道侣游山,得之彼览,粗知灵迹之所自云。^{[3]90册,283}

该书是唐代道教在南岳兴盛的重要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书中先列五峰、三涧,次叙宫观、祠庙、坛院之属,而以历代得道飞昇之迹附之。虽黄冠自张其教,不无夸诞之辞。而唐世名山洞府之书,如卢鸿一《嵩山记》、张密《庐山杂记》、令狐见尧《玉笥山记》、杜光庭《武夷山记》,今并无存。此独以旧本流传,胜境灵踪,足资掌故,是亦考图经者所宜据矣。^{[7]上册,956}

对于该书在保存名胜古迹方面作出了较高评价。该书对南岳道教古迹的记载非常详尽,如其中《衡岳观》云:

衡岳观,在华盖峰下。按旧碑,晋太康八年,徐真人灵期、邓真人郁之建置。梁天监二年,周真人静真再加弘葺,武帝赐三百户庄田充基业。至隋大业八年,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往观焚修,兴行教法。其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资用。

唐贞观二年,太宗重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

人,为国焚修。高宗弘道元年,请叶天师法善封岳,辟方四十里,充观院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畋猎,罢献琛,以为常典。观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刘天师真堂,后有尹真人上升坛。其观碑文,隋学士曹宪撰,今见存焉^{[3]90册,283}。

该书不但记载了南岳道观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详细记载了南岳道士的姓名和人数。《唐朝得道人在岳一十四人》云:

殷先生景童,天宝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萧先生灵护,弘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师思慕,天宝十四年八月廿六日得道。
何尊师隐其名,天宝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师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师仙乔,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师待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玄和张先生太空,大历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宫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历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午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广成刘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师混污,会昌二年正月得道。
韩威仪,大中元年上清宫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陈微君、冯微君、张微君三人,不就微,皆于天台山相次得道^{[3]90册,285}。

这些充分说明南岳衡山在唐代已经成为了道教的圣地。因此作为信仰道教的韩愈见到这些古迹就有了创作的题材。

(三)韩愈的衡山道教文化散文和诗歌

韩愈的衡山道教文化散文和诗歌是韩愈由连州山阳令移江陵府掾曹是第二次途经衡湘所创作。包括著名的《送廖道士序》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这一年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韩愈37周岁,已经进入散文创作的高峰。此前他已经于贞元一十七年(公元801年)写下了《送李愿归盘谷序》,贞元一十九年(公元803年)写下了《祭十二郎文》等经典范文。《送廖道士序》是韩愈步入创作生涯顶峰后的作品,既充分反映了作者驾驭散文的娴熟艺术,也是韩愈的衡山道教文化散文的代表作。韩愈《送廖道士序》云:

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微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郁积。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蜒扶輿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没于佛老之学而不出邪?廖师,郴民而学于衡山,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与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别申以问之。

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称赞韩愈散文风格“猖狂恣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

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突出表现在《原道》、《原性》、《原人》、《师说》、《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等论说文。而《送廖道士序》则代表了韩愈散文的另外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按照欧阳修的体会是“自然”,如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记载欧阳修的话:“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这是一种平易的风格。宋代散文就沿着韩愈开创的这种风格发展,形成了自然平易的文风。这种文体属于赠序类,姚鼐《古文辞类纂》的赠序类序文高度评价韩愈这类散文“乃得古人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韩愈的赠序对后世文体文风的影响反而比他的论说文要大。《送廖道士序》与《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其他同类作品相比较而言,在于突出了衡山道教文化,以自然平易的笔调抒写了衡山神灵对出身于郴州的廖道士的感化,这是地域文化在韩愈作品中的重要表现。

此时韩愈也即将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因为在时间上处于韩孟诗派两次较大的聚会之间。第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公元796~800年)间,韩愈与孟郊、张籍、李翱往来;第二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公元806~811年)间,韩愈与孟郊、张籍等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也就是说《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是作者临近诗歌创作高峰的作品,实际上已经开启了怪奇诗风的先导。这也是韩愈的衡山道教文化诗歌的代表作。《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

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

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

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

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庙令老人识神意,睚眦顷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窞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

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朦胧。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4]10册,3789-3790}。

诗歌形象地描绘了五峰中四峰,南岳五峰包括祝融峰、紫盖峰、云密峰、天柱峰、石廪峰。《南岳小录·五峰》云:

祝融峰,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诸峰之北,最高,拥诸峰而直上。有祝融庙基,及青玉坛、光天坛、白壁坛、雷公池、风穴仙梨树、上清院基。峰之东南,有李泌书堂。

紫盖峰,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嵯峨,有似麾盖,因以为名。上有仙人池、七真阁,下有紫盖院基、王氏药堂。

云密峰,昔夏禹治水,登此峰立碑,纪其山高下丈尺,皆

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灵,隐而不见。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峰,其形似柱,因以为名,亦名柱括峰。下有魏夫人石坛,或云魏夫人在此处得道。

石廩峰,远望如仓廩,其上方阔十丈,传云傍通洞府。昔有洞门观,胡浮先生常乘白豹游之。又有小石廩峰,下有舜庙,又有华盖、峭崿、榔钵、回雁,皆小峰之数^{[3]90册,283}。

只有云密峰没有涉及。估计当时韩愈没有见到此峰。诗歌中提到杯蛟,据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卜教》:“后世问卜于神,有器名杯蛟者,以两蚌壳投空掷地观其俯仰,以断休咎。自有此制后后人不用蛤壳矣。或以竹或以木略斫削使如蛤形而中分为二,有仰有俯。”该书《四库提要》评价说:“多精深明确,足为典据。”^{[7]上册,583}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提到高辛庙有竹栝笏,以一俯一仰为圣。韩愈所打的应该是一俯一仰的圣卦。诗歌不但体现出了怪奇的风格,如“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而且表现了“以文为诗”的手法,如“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庙令老人识神意,睚眦伺能鞠躬。手持杯蛟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瞳胧。”这些叙述事情发展的语句。

从韩愈的生平创作来看,此时韩愈已经步入散文创作生涯顶峰而且临近诗歌创作高峰,他的衡山道教文化散文和诗歌不但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如涉及衡山的独特神灵,衡山山峰面貌等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著名的“以文为诗”

的形成过程,例如是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

(四)韩愈衡湘道教文化的意义

韩愈衡湘道教文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体现出了他信仰道教,从而使人对他的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等等。最突出的当然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现在衡湘的许多古迹都是因为韩愈的原因的留下的,如《光绪湖南通志》卷三十三《古迹·衡山县》云:“开云楼在县北,楼在南岳行祠,唐韩愈经此。宋苏轼谓愈能开衡山一云,故以名楼。”^{[6]2册,880}又《古迹·衡阳县》云:“合江亭在石鼓山蒸湘二水合流处。唐刺史齐映建。唐韩愈《合江亭》诗见金石门。”^{[6]2册,878}

[参考文献]

- [1] 韩愈. 韩愈散文选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 [2] 刘昉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王云五. 丛书集成新编[M].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
- [4] 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5]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李瀚章等. 光绪湖南通志[M]. 长沙:岳麓书社,2009.
- [7] 四库全书研究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本)[M]. 中华书局,1997.

Han Yu and Heng Xiang Culture

ZHAO Run-jin, LIU Yu-f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Han Yu called “Heng Xiang” together in his prose, “Heng” refers to the Heng Mountain, “Xiang” refers to the Xiang River. Han Yu went pass Heng Xiang four times. His work involves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third time of his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second experienc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 He wrote a famous essay “see Liao Taoist off in narrative writing” and “call on temple, stay in the temple for the night and write on the temple gate”. Heng Mountain is the Taoist holy land, and Han Yu believed in Taoism. His prose creation matures before poetry and influences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most prominent sector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an Yu; “Heng Xiang”; prose; poetry